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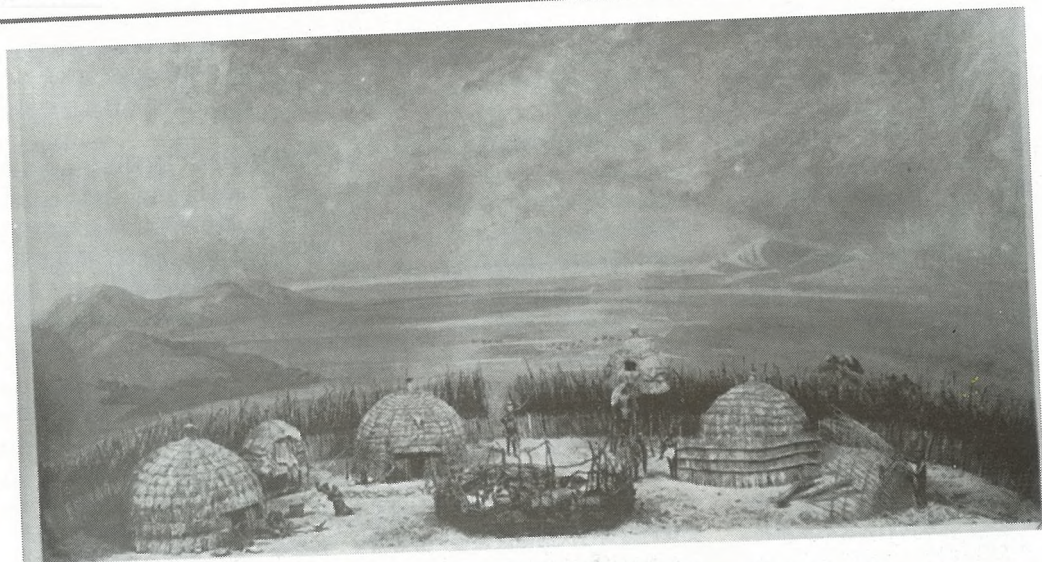
资的行动方式呢?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我们模型的妇女运动中的意识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不是所有的、目前正在进行的对于妇女运动的重要研究,就肯定是意识提高的一种直接结果,那么甚至在依靠意识提高的同时也已经产生了知识。我可能期望我所建议的意识提高,对我们的知识产生类似的影响:即它可能会产生对隐蔽课程的研究,这种研究同样又产生出新的研究对象。因而,虽然非学校教学安排中隐蔽课程的知识肯定是需要的,但是意识提高能够从我们仅有一点点知识开始,预计我们不久就将拥有更多的知识。

为了不存在任何怀疑,我们的确为开始意识提高拥有某种基础——如果其他方面一无所有,那么在课程安排方面我们则拥有自己的经验。然而,我们目前可能拥有比我们所获得的更多的知识。我们关于学校隐蔽课程的知识主要有两个来源:那些一直在学校工作的人和那些已经对学校进行研究的人。为了发现其他公共机构的隐蔽课程,我们必须求助于那些研究它们的人:求助于医疗社会学家和家庭、教会、科学、运动、以及企业社会学家。我们还必须求助于那些学习和提供海湾地区管理培训课程的人,和那些管理电话公司总机的人。一些洞察力强的从业者并非完全垄断了学校。医院、企业、甚至市政厅也拥有为我们检查和记录隐蔽课程的 James Hermdons 和 John Holts。

应由谁来进行这种意识提高呢?就学校将它们的学生送入非学校教学安排学习而言,人们可能希望他们会进行自己的意识提高:即医学院可能会为

未来的实习医师进行意识提高,社会工作学校为作现场调查的学生进行意识提高,教育学院为实习教师进行意识提高,以及中学校为那些派出在现场学习的学生进行意识提高。人们可能希望,试图废除自己的隐蔽课程同时又将学生关闭在校园内的学校,也会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进行关于隐蔽课程的意识提高会议。实际上,这样做的一些学校可能会成为社会机构评论的中心。我坚定地认为,学校应该为这种功能服务,但是也许只能乐观主义者才会认为只要学校仍然保持公共性质和社会仍然保持现状,那么学校就能够或者可能为这种功能服务。然而,就隐蔽课程而言,学校并非意识提高的唯一可能的论坛。就象妇女已经做的和黑人已经做的那样,某一特定隐蔽课程的牺牲者能够为他们自己这样做。

正如我已经谈到的一样,并不能保证意识提高将会成功地将我们隔离起来,不受我们不想要的和不应获得的学习状态的影响。肯定地说,我们不必将它看成为教育制度和社会改革的一种代用品。可是,正如妇女运动已经表明的那样,对于人们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情况加以了解,可能具有一些强有力的作用。可以说,我不会指望某个意识已私下提高的个体,去经受把他或她放进的一种教学安排的隐蔽课程。但是当分享知识和存在强有力的同事支持时,意识提高可能是经受隐蔽课程的个体所拥有的最好武器。



祖鲁人营地的主体仿真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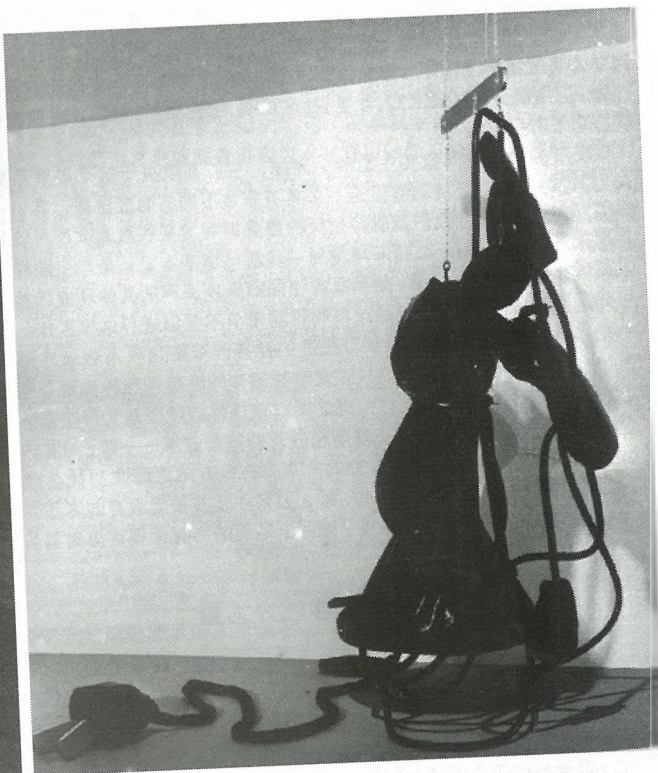
《艺术与人类学》插图选

唐英译



作色木制品

安迪·华霍尔 作



软体风扇巨人

克劳斯·奥顿伯格 作